

清代内府大藏经的刊刻*

翁连溪** · 李京珉***

— 목 차 —

1. 藏文《甘珠尔》与《丹珠尔》的刊刻
2. 蒙文《甘珠尔》与《丹珠尔》的刊刻
3. 汉文《龙藏经》的刊刻
4. 满文《大藏经》的刊刻

中文摘要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历代的传布, 翻译汇集编次久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宝藏。自北宋开宝年间, 我国第一部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后, 陆续刊刻有北宋《崇宁藏》、《毗卢藏》、南宋《资福藏》、《万寿藏》、《赵城藏》、元代《元官藏》、明代《洪武南藏》、《永乐南藏》、万历《嘉兴藏》。清代中央政府内府, 继前朝的传统继续编刊了多部不同文种的大藏经, 但由于对每部大藏经的刊刻人员、时间地点、存世情况等问题多有不同论述, 现据清内府档案与存世大藏经的情况做进一步考证, 将对清代内府大藏经的刊刻有较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 清代内府, 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 蒙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

* 这篇文章是把原载录于《清代内附刻书研究》(故宫出版社, 2013)中的“第二章·第一节: 佛教大藏经的刊行”内容重新整理、修改而写的。

** 제 1저자 翁连溪,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

*** 교신저자 李京珉, 东亚大学校中国语系(ktianlong@gmail.com)

引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历代的传布，翻译汇集编次久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宝藏。大藏经又称“一切经”，简称为藏经、契经或三藏，即将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卷帙极为浩繁。宋代以前，大藏经都是以手抄形式撰集，五代十国时的闽国主王审知，曾用“泥金银万馀两”书写成四部《金银字大藏》，既糜财费时，又不能大量生产、广泛流传。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使印制大藏经成为可能。据《佛祖统记》卷四十三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版”，首开雕印大藏经的先河。陆续刊刻有北宋《崇宁藏》、《毗卢藏》、南宋《资福藏》、《万寿藏》、《赵城藏》、元代《元官藏》、明代《洪武南藏》、《永乐南藏》、万历《嘉兴藏》，其后递代不绝。入清之后，清代中央政府政府，继前朝的传统继续编刊了多部藏、蒙、汉、满文不同文种的大藏经，是历代中央政府刻印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清内府自康熙八年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经完成(现藏台北故宫)，康熙三十九年内府刻藏文《甘珠尔》、康熙五十九年内府刻蒙文《甘珠尔》、雍正年间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乾隆帝赐西藏布达拉宫)、乾隆十四年内府刻蒙文《丹珠尔》、乾隆三十五年内府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北京故宫藏96夹台北故宫藏12夹)、乾隆五十九年刻《满文大藏经》(北京故宫藏76夹，台北故宫藏32夹)。但由于对每部大藏经的刊刻人员、时间地点、存世情况等问题多有不同论述，现据清内府档案与存世大藏经的情况做进一步考证，将对清代内府大藏经的刊刻有较明确的认识。

一、藏文《甘珠尔》与《丹珠尔》的刊刻

相比于汉传佛教,清代诸帝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其中既有个人宗教信仰的倾向性,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对于朝廷而言,藏传佛教的意义远远超过宗教本身,是强化对藏蒙的统治,笼络、怀柔蒙藏上层的工具.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乾隆帝在雍和宫立“喇嘛碑”,御笔亲书碑文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又特别强调:“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道理讲得很透彻,话说得也很坦白.故定鼎之后,清廷最先刊刻的就是藏文蒙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汉文大藏经尚在其后.

(一) 藏文《甘珠尔》的刊刻

西藏学者仁钦札巴(Rin-chen-grags-pa, 即布顿Bu-ston, 1290~1364)曾参与西藏大藏经策巴目录校订工作,将藏译佛典分别为教敕译典(即甘珠尔,又称正藏)和论述译典(即丹珠尔,又称副藏)二部门,是西藏藏经特有的分类法.“甘”意谓教,“丹”意谓论,“珠尔”则谓翻译.《宝性论》中说:“凡与法有关具义之事,能除三界烦恼之善说,颇具明示寂静功德者,即为佛陀所说而非他”.意思是所说皆与法有关,功用在于断除三界烦恼,而果则为般涅槃.凡明示此内容者之语,依圆满正觉之佛陀而出之善说即称为“甘”,将所译的佛语集而成册就是“甘珠尔”,也就是藏文大藏经.

明永乐八年(1410),成祖朱棣为他去世的妃子徐氏追荐冥福,邀请藏传

佛教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银协巴任总纂，敕令在南京灵谷寺刊刻《甘珠尔》，是藏文大藏经在内地的最早镂版。1410年的《甘珠尔》被用来当作1602年开始刊印的万历版《甘珠尔》的蓝本，由于木刻版遭毁坏，这些北京版的两个摹版已是凤毛麟角，十分稀少。1410年《甘珠尔》现存的木刻版似乎成了两个《藏文大藏经》的刊印蓝本。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和硕裕亲王福全上题本〈请序疏〉称：“为释藏名经奉命镌梓恭请御制序文宜示永久事：窃惟嘉维诞瑞象法，肇开八正五乘，毗耶摩诃授受远矣。自汉帝梦感金仙遣使天竺，释典诸书之流传于中土者几二千年，其间虽历唐宋隆盛之朝，亦多阐明褒赞，非徒广扬佛教，正欲藉以慈育万有也。恭遇我皇上聪明睿知……宵衣旰食，勤政爱民，复以万机余闲，研精六经，综览群史，靡图畴永发之渊微，鉴治运相循之理数，以至星官地志、诸子百家、稗乘纬书、仙经贝叶，莫不丙夜详探，究其旨奥，故能学洞阴阳，博极古今。……兹重刊番藏名经，用广利益，盖以上凝太皇太后、皇太后万寿无疆之祜，下锡四海臣民亿万载之祉，但四流六度，妙理难殚，非得天语发挥下土，尘迷何由共开觉路？昔唐太宗敕名僧翻译经文六百馀部，特制序文；明太祖亲撰佛母像赞；永乐中校刊大藏真经，皆当开国盛事，表章梵典。况我皇上仁敬孝虑，迥非唐明三君所能比拟万一，宸翰所颁，便可烛照诸天，康济率土。伏祈皇上俯念佛果，特赐御制序文弁诸经首，开示颡蒙，昭垂万祀，庶慧日赖奎章而并焕慈云，同圣泽以长流矣。为此具本，谨题请旨。”十八日奉旨：“礼部详察典例，确议具奏。钦此。”九月初一日，礼部尚书介山具题本〈覆请序疏〉称：“礼科抄出和硕裕亲王福全等题……臣等窃惟释典诸书充牣秘藏，虽教有显、密之分，宗有性、相之异，要其指归在利济万品，化导群生。历代帝王往往为之流通宣布，或命翻译，或命镌梓，其教赖以弗替。至于阐物道风，恢弘胜果，尤在亲制文辞，冠之简册，方足令神

1) (法)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人钦仰。……兹者体天地好生之心，扩圣人止孝之量。上为两宫禔福，下为百姓降祥，特命刊刻释藏名经，流通海内。顾释典难谳，梵书乍布，必得天语褒扬，方可炳著日月。允宜俯从王等所请，御制序文冠诸经首，俾琅函宝笈，沾被龙光，昭示天壤，永永无极，诚昌朝之盛事，圣代之旷典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从福全题本中所言，既然“为释藏名经奉命镌梓”，是镌刻藏文《甘珠尔》已有圣命，这两道题本都是请求皇帝赐予序文。康熙帝遂于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颁赐〈御制番藏经序〉云：“……谛伏惟太皇太后遐龄永锡，斋心舍卫之城，皇太后纯嘏殷报礼祇洎之役，曩者林衡授矩，无非桂栋梅梁；于焉竹素成编，尽是雕谈奥辩。供亿靡劳于葩屋，不涉民财；经营悉出芝宫，非关内帑。念真乘之慧业宜宣，而梵叹之潮音未广，乃稽历古传灯之录，更辑千山印钵之篇。番藏旧文，爰加镌刻，绿缥装就，八解高超，黄锦开时，七花运迈。诚以导螾晖于紫幄，分黄彩于黄图。助启芳途，广崇大藏。颂两宫之景福，延万姓之鸿庥。式弃简端，用资褒赞云尔。”康熙帝的序文明确指出了两点，一是康熙帝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祈福禳灾的功德善举，同时也祈望百姓能藉此得到佛的庇荫；二是特别声明，所用一切费资“不涉民财，经营悉出芝宫，非关内帑”。后者是说给大臣、百姓听的，也是说给佛听的，既然为两宫祈福，当然要自出己财，才有更大的功德。其实，在王朝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芝宫不事生产，钱财来自“内帑”，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过，有了皇帝的序，也有了经费来源的明确指示，自然就可以校理群经，开工雕造了。

据该经载参与职官名录，领衔总理监造《大藏经》的是和硕裕亲王福全，监造官员以内阁侍读学士舒辂为首，共30人；校阅经字喇嘛以总管京都喇嘛班第查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为首，番文总教习索诺颜绰尔济副之。从事具体工作的对读经字喇嘛均为黄寺的藏族喇嘛，以根敦达尔扎克龙为首，共40人，对勘(总校对)喇嘛是章嘉胡图克图，下属住持喇嘛王子克津巴格隆、罗卜藏巴尔柱格隆等六人。监修官以内阁侍读学士食二品俸加四级乌拉代为首，共13人。校阅序目录官为丹代、拜礼、翁英三人；翻译番字

序目录官为武熙布、登德二人；翻译蒙古字序目录官为喇嘛璋、黑鈞二人；满文誊录官为伊巴礼、增寿、禅布三人；汉文誊录官为曹占吉、王启沃二人。番文誊录喇嘛为罗卜藏鲁雷格隆、罗卜藏拜尔济格隆、索那木林亲格隆三人。各项工作共105人，几乎网罗了全部在京的藏传佛教高僧。²⁾康熙版藏文《甘珠尔》自二十二年开雕，历时十七年，至三十九年始竣工。史称“北京版”，版藏嵩祝寺，又称“嵩祝寺版”，经文朱印，亦称“赤字版”。全部刊刻、装潢完成后，总一百零九函(夹)。首为藏、蒙、满、汉四种文字刊印的康熙帝御制序文、和硕亲王福全请序疏、礼部尚书介山覆请序疏、参与修撰的105人的职官名录，及藏、蒙、满、汉四种文字刻印的《甘珠尔经》目录，共收佛教经典972种。每函(夹)由外护经板、内护经板、经叶三部分组成。外护经板上、下两块，杉木，出脊描金，髹朱漆，长73.7厘米、宽23.3厘米、厚2.5厘米。内护经版分上、下两块，均长72厘米、宽22厘米、厚2.1厘米，明黄色织锦包衬上护经版中间朱印经名，两侧“合欢门”内各有一尊金碧彩绘如来趺坐于莲花座上的说法图，一有十方诸佛、八大如来、七佛、三十五如来、三世佛，并以红、黄、蓝三色织锦覆盖其上加以保护；下面的护经板有精心绘制的四大护法神，从右到左为：财续天母、偌玛提天母、六臂怙主、财神，经叶长72厘米、宽22厘米，版框长57厘米、宽14.3厘米，每页横八行，四周双边，栏框右侧刊有汉文经名及叶码，左侧为藏文经名、页码。学界一直认为上下内护经板中佛像为彩绘，其实应为版刻填色，而佛像的风格来源于明永乐版及万历版。藏文甘珠尔上下内护经版有三种不同佛版画：一、两边佛像彩绘，中间泥金书经名；二、两边佛像为雕版印刷后填色，中间朱印经名；三、上下内护经版佛画文字均为木板朱印。经叶为双面朱印，经叶码放整齐，经墙彩绘，出幢、鱼、瓶、莲、海螺、盘肠、宝伞、金轮吉祥瑞；为防经叶散乱，一端朱红、墨彩绘制喷

2) 李国强,《康熙朱印藏文《甘珠尔》谈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 第4期 第69页。

焰摩尼图,另一端绘制火焰图,图中用藏文书写该卷经名,装帧极为华丽。但总起来看,永乐版的镌刻,字画遒劲,婉转如意,康熙版则刀刻偏软,线刻也不如永乐版流畅。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全藏。据载:经版原存于北海大西天大圆智宝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圆智宝殿遭劫掠;民国二十六年(1937)又羈火厄,大部分经版下落不明。现故宫博物院尚藏有少量此经版,但也是十不存一了。

(二) 藏文《丹珠尔》的刊刻

《丹珠尔》作为西藏大藏经的副藏,意即“祖师部”或“论疏部”,主要搜集历代佛教著作,相当于汉文《大藏经》的论集部、经疏部、律疏部、论疏部、史传部等,其中还包括了部分五明杂著及西藏学者的撰述。最初形成于八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被编入《丹迦目录》(其中包括甘珠尔部)。后刻板流通,各种版本的《丹珠尔》的分类及收经互有不同。如德格版《丹珠尔》分成赞颂部、秘密部、般若部、中观部、经疏部、唯识部、俱舍部、律部、佛传部、亲翰部、因明部、声明部、医明部、工巧部、明部、西藏撰部、补遗经论部等16部分,共213函,3400余部。纳塘版《丹珠尔》则分成赞颂部、秘密部、经释部、声明部等四部分,共224函。北京版《丹珠尔》分成赞颂部、秘经疏部、经疏部等三部分。

康熙六十年二月初三日,康熙帝降旨拉锡“著刻《丹珠尔经》经版,刻完之后即送西土”,时距藏文《甘珠尔》刊成已经21年了。刊刻《丹珠尔》,首先要解决底本问题,拉锡恳请蒙古活佛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藏语:RjeBtsunDamPa;蒙语:JavzandambaHutagt)协助。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属藏传佛教格鲁派,与章嘉呼图克图并称为外蒙古两大活佛,是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齐名的藏传佛教的四大活佛之一。刊刻大藏经,他自然义不容辞,遂从西藏请来一部藏文抄本《丹珠尔》。

解决了底本问题,为了顺利编辑、刻印,共挑选了符合要求的喇嘛、学者等五百余人,由扎萨克达喇嘛吉木巴扎木素、拉木巴扎木巴、索诺木绰尔济呼毕罕、扬察尔喇嘛等四人监造,喇嘛罗卜桑格隆等十多名负责校对,妙应寺达喇嘛祖勒齐木端罗布格隆负责刻写工作.并从武英殿造办处咨调画匠,以负责绘制《丹珠尔经》里面的各种图案.同时,康熙帝还钦派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礼部右侍郎罗瞻总负责《丹珠尔经》经版的制作工作.³⁾

雍正二年(1724),《丹珠尔》刻印完竣,总234函,3523余部,有藏、蒙古、满、汉四种文字的总目录,是现今所知《丹珠尔》第一次在内地镂版.分为赞颂部、秘经疏部、经疏部三部分,并将《宗喀巴全集》、《二世章嘉全集》续刻后补于其中,是这些作品的首次入藏.乾隆二年(1737)内府又将康熙刊版《甘珠尔》与乾隆版《丹珠尔》同时刷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印制工作至此全部完成.

二、蒙文《甘珠尔》与《丹珠尔》的刊刻

(一) 蒙文《甘珠尔》的刊刻

蒙文《甘珠尔》是据藏文本翻译,以蒙文传写的大藏经,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在萨迦派僧人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汉族等各民族僧人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刻版刷印,在蒙古地区流通,是第一次将大藏经刊刻为蒙文,但这个本子,已无片纸只页传及今世了.清康熙年间,再刻蒙文版《甘珠尔》,不仅是藏文《甘珠尔》刊刻后的又一盛举,也是蒙古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康熙五十五年干清门侍卫拉锡为奉旨刊刻蒙文《甘珠尔经》事的奏折,

3) 参见安双成,《蒙文《甘珠尔经》与藏文《丹珠尔经》制版概述》,《历史档案》1989年 第2期 第90页.

记述了刊刻、办理蒙古文《甘珠尔经》的工料来源、经费支出、主持人、蓝本来源、校勘经过、誊写及镌刻人员、刊刻场所、经版存放地点,为我们了解蒙文《甘珠尔经》刊刻的全过程提供了重要数据,奏折称:“为请旨事,康熙五十五年四月初四日,奴才口奏:主子前谕一等侍卫善绶,据闻尔家中有蒙古《甘珠尔经》。京城有吐蕃特《甘珠尔经》版,却无蒙古《甘珠尔经》版,倘若刻版,则甚佳也,此乃一善事,着转告干清门侍卫拉锡,召集八旗蒙古大臣、侍卫、官员、巴克什等共同会议,若布施刊刷,非但颇益于供诵,且较抄写价廉。着将此共同会议布施,朕亦布施。钦此。窃惟圣主崇尚佛教,为仁爱众蒙古令行善事,又为《甘珠尔经》义流传万世而颁降谕旨,殊属可叹”,把刻印蒙文《甘珠尔》的缘起记载得非常清楚。康熙的谕旨,对刊经底本的使用——善寿家藏抄本;经费的来源——布施化缘;刊经的组织者——拉锡等,都做了明确的指示,并且表示“朕亦布施”,这既是为了刊经的功德,也是一个姿态,皇帝善信至此,慷慨解囊,蒙古王公贵族自然会趋之若鹜,刊经最重要的一环——不菲的费用,也就迎刃而解了。

另据拉锡奏折:“刻制蒙古《甘珠尔经》诸所用布施钱粮,既然关系甚重大,着将此交理藩院(广善库)办理。京城八旗蒙古等、外四十九旗扎萨克蒙古、游牧处察哈尔蒙古、京城喇嘛、外地喇嘛等给之布施银总数由理藩院(广善库)查明收取奏闻,以用于刻制《甘珠尔经》。为此谨奏。请旨。朱批:倘由理藩院收,此部原怠惰,交广善库一处,钱粮方可清楚。”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刻印蒙文《甘珠尔》的圣旨一下,在蒙古族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蒙古王公、贵族、喇嘛纷纷予以布施;而且,康熙帝对此事的关注,可以说及于各个方面,从而为蒙文《甘珠尔》的刊刻提供了保障。蒙古贵族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对如何刻印好这部蒙文大藏,也是殚精竭虑,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如拉锡奏折称:“喀喇沁固山贝子善巴喇什、苏尼特 贝勒西哩闻此奇旨,谓吾曰:圣主弘扬佛教,俾全蒙古积福之善事,亘古未有。命镌刻《甘珠尔经》版者,实为弘扬佛教。我二人思惟,今存蒙

古《甘珠尔经》俱系辗转传抄，漏讹甚多，今一经刻版，将永世流传。太皇太后之吐蕃特《甘珠尔经》版，刊校甚细，制作完备。倘蒙俞允，将我蒙古《甘珠尔》与吐蕃特《甘珠尔经》详细校勘，拾遗补阙，妥加恭刻，则不胜善哉！校此《甘珠尔经》，宜拣选多伦诺尔之诺颜席热图、达喇嘛粗勒齐森噶布楚及我等之熟悉经书之贤能喇嘛、巴克什等携我处之蒙古《甘珠尔经》前往，共同详细校勘镌刻为宜等情具奏。奉旨：甚好！海瑟·噶尔美与贝勒西哩、贝子善巴喇什等携往多伦诺尔较勘可也。再，布施不可指派，概视所愿。钦此。钦遵。”可见，这部大藏经的校理是有来自蒙古和京城的大德高僧共同完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无比是这部藏经的质量可以和藏文《甘珠尔》相媲美。康熙强调：“布施不可指派，概视所愿。”也是对蒙古人宗教意愿的极大尊重。

康熙俯允所请后，贝勒西哩、贝子善巴喇什等人即组织人员在多伦诺尔庙内开始校勘工作，据拉锡奏折：“兹于多伦诺尔庙校刊后送来蒙古《甘珠尔经》一部，百八函，经清点经，共四万五千张，为刻制蒙古《甘珠尔经》版”，至此，蒙文《甘珠尔》纵欲有了一部完整的稿本，刊刻可以进入实施阶段了。

拉锡奏折中说：“刻制此《甘珠尔经》于皇城内油毡房制作。缮写经文之喇嘛巴克什等，亦集于此房内缮写。将缮写经文校勘刻等等，交喇嘛巴克什等监制。制作完竣后，入进金榜库放置。”言之凿凿，似乎不应再有疑问，但这部藏经到底在何处刊印，一直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的问题。拉锡奏折同时也说道：“查得，妙应寺大喇嘛诺尔布格隆既甚熟悉刻制图伯特、蒙古佛经之事，现将刻制《甘珠尔经》，交付诺尔布格隆制作。”诺尔布格隆刻经之地，是在油毡房还是在妙应寺，就成了一个疑问。忒莫勒先生认为：“至于皇城油毡房说，尽管有满文朱批奏折〈干清门侍卫拉锡奏为奉旨刊刻蒙古文《甘珠尔》经所需费用等情折〉作根据，但那毕竟还是尚未实施的拟议，虽然经过康熙皇帝的允准，我们还不能将其视为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何况此油毡房(翻译是否正确?)及经版库究竟是何种机构?

确址在哪儿?隶属于谁?尚有疑问.先生又据〈理藩院咨伊克昭盟盟长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札萨克贝子喇什达尔济文〉所记:“旗籍[清吏]司案呈:准典属[清吏]司移送公文内开:本司呈:嘉庆六年(1801)仲冬二十二日军机处抄出:大学士臣庆[桂]等恭奏:遵旨,查从前各蒙古之迎请甘珠尔经、丹珠尔经,均由理藩院奏准,交妙应寺喇嘛刷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学士贝勒傅[恒]等奏称:各蒙古请经,若交喇嘛刷印,需时甚久,且蒙人亦感烦劳.可以的话,将此种经书交付武英殿,预先刷印数部备用,倘有各蒙古迎请,报院即可获得,实属诸多便利之事.奉旨:依议”等资料,认为这部藏经是刻印于妙应寺(白塔寺)认为这部大藏是在妙应寺刊刻完成的.先生的论证是有一些道理的,但先生印证的数据中,又有“将此种经书交付武英殿,预先刷印数部备用”之语,仍然不清楚是妙应寺刷印之后,将书交付武英殿备用,还是武英殿直接负责组织刷印?蒙文《甘珠尔》卷帙浩繁,书版不可能搬来搬去,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存储处所,才合常理,故笔者认为,油毡房很可能只是对经书进行校对、誊写的地方,定稿后在妙应寺雕铸印刷,刷成的经交武英殿保管,(其他论文没有此记载)古各旗请用.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推断.好在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关键是清代完成了蒙文《甘珠尔》刊刻的盛举,至于其在何处刊印,在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解决上述源文件记载的矛盾时不妨姑且存疑.

据拉锡奏折内容,蒙文《甘珠尔》经,“一百八函,绘雕其两边之二佛像、中间之“南无”字、四周之番草花,一块版以二两计,绘雕一百八块版,需用手工银二百十六两.第二四周绘画番草花及刻字,雕刻一块版,以一两二钱计,一百八块版,需用手工银一百二十九两六钱,一部《甘珠尔》末尾之四块版,每版绘雕四尊金刚佛、四周绘雕番草花,每块版以五两四钱计,四块版需用手工银二十一两六钱.”现存蒙文《甘珠尔》印本,末尾为五尊佛像,而且绘雕四块版轮番施印,与现存印本不同还待研究.

蒙文《甘珠尔》经版的存世,佛像雕版的发现,通过与存世的几部印本相较,现今可知康熙五十九年刊刻的蒙文《甘珠尔》经中的扉页尾页756

尊佛像，不但有雕版印刷的佛像版画、印本填色彩绘佛像版画还有彩绘佛像画三种，这些佛像为清代早期的蒙古佛像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为研究清代蒙古、藏传佛教图像，佛教版画史提供了新的数据。

(二) 蒙文《丹珠尔》经的刊刻

蒙文《甘珠尔》刻成后，尚未来得及刻印《丹珠尔》，康熙帝已逝。至乾隆帝即位后，自然要完成乃祖未尽之事，故于乾隆六年(1741年)下旨，命三世章嘉和噶勒丹锡呼图克图将藏文《丹珠尔》翻译成蒙文。《蒙古佛教史》对此载之甚详：“二位上师遵照皇上旨意，主持其事，在翻译之前，因广大蒙古各地的语言虽大致相同，但微小的差异仍有许多，特别是翻译经典所用的词汇未曾统一厘订。各位译师按自己的意愿安立不同的词语，以致闻思经典的僧人们难以理解，故向皇帝奏闻，统一译经所用词语然后刻版印行之好处。皇帝大喜，即下令照此办理。”⁴⁾

显然，统一佛教术语，以免翻译起来各行其是，是保证翻译质量必不可少的一步。章嘉是清代敕封给“国师”称号的唯一一位西藏活佛，也是一位精通满、藏、蒙文字的语言大师。为了确保翻译术语统一，他亲自编订了《正字法——学者之源》一书，对各种术语标注了藏、蒙两种文字进行对照，制定了翻译规则，等于是给翻译工作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规范了翻译用词后，在三世章嘉和噶勒丹锡呼图活佛的主持下，诸多精通佛典的高僧和精通藏蒙两种文字的译师开始了工作。经过十三个月的艰苦努力，到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蒙文《丹珠尔》译好。乾隆帝审阅后大喜，赞不绝口，对参与翻译的人员多有赏赐，并且动用帑金进行刻印，然后颁发给蒙古各处。⁵⁾

4)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蒙古佛教史》第165~166页，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

5)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蒙古佛教史》。第165~166页，

这次翻译使用的底本,有人说是以西藏刊印的德格版为蓝本,依据可能是雍正七年(1729)德格第四十二世土司却吉·登巴刻印了《甘珠尔》,其子贡嘎·次乃嘉裕继刻《丹珠尔》,这部《丹珠尔》内容丰富,刻版讲究,当时在国内就极享盛誉,且其刊刻时间与蒙文版相吻合,很容易使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印度学者罗克什·钱德拉将德格版《丹珠尔》、北京版藏文《丹珠尔》与蒙文版《丹珠尔》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德格版的内容、排列顺序等与蒙文版皆有异,而康熙时刊藏文《丹珠尔》则与之相同,因而得出结论:“蒙文版所据并非德格版”,“两个版本(即康熙版《丹珠尔》与蒙文版《丹珠尔》)中函册编排的一致以及作品名称和各个函的安排完全相同……甚至篇名的排列顺序也相同……现在,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蒙文版依据了北京藏文版。”⁶⁾迄今为止,刊刻蒙文《丹珠尔》的资料,在清宫档案中尚未发现,罗克什·钱德拉的研究,解决了蒙文《丹珠尔》刊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著录,这部蒙文《丹珠尔》刊刻于乾隆七年至十四年(1742~1749),朱印,版框高17厘米,长59厘米,每部224函(夹),佛版画每夹由上到下一共三张。另目录1函(夹),由相互对照的蒙、满、藏文、汉四种文种目录为一函,满文目录题名为《御制蒙古文丹珠尔总目录》;藏文目录题名为《翻译一切典籍总目三界安乐笑发莲花日》;汉文目录题名为《御制续藏经总目录》,于各目录前有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十五日《请序文》和乾隆十四年(1749)《御制续藏经序》。卷末有雍正二年秋《总目录后续》(此后续蒙文目录内无)在乾隆十四年《御制续藏经序》中,云:“章嘉胡图克图原著《百千法语经》7函……宗克拔(宗格巴?)所著《百千法语经》20函同入大藏刊刻颁行”,是经刊刻未收二经大师的著作,另行刊印颁发。序中云:共有135人参与译经,加笔帖式等共计163人。内蒙古自

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

6) (印度)罗克什·钱德拉,《蒙古文《丹珠尔目录》前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年 第3期 第51页。

治区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有藏。

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七世达赖格桑嘉措(1708~1757)对这部经典成功翻译为蒙文并在北京刊刻成功很是赞赏。他说：“(三世章嘉)自水狗年(藏历,乾隆六年,1741)起翻译《丹珠尔》蒙文,译成后又修改译稿,担任主校对师,对此利益众生之功德,竭尽全力。我亦曾见到大成就者章嘉活佛为有利于校订译稿而编成的《正字法》字典,它可以和从圣地印度把佛经首次译成藏文时符合法王译师们心意的《语合二卷》和《翻译名义集》等著作相媲美,受到大众赞誉。从前在西藏这块土地上,人们不明善恶之取舍,如坠黑暗之中,依仗法王译师们之鸿恩,使佛教之光辉如旭日东升。与此相同,汉地蒙古广大地区受历代皇帝之恩德,以广大智慧使佛法传布,现今又如雪域一样,定会使佛法明灯极为明亮。我非常敬仰敬慕大皇帝的功绩和这些奉命完成事业的人们,心中特别欢欣鼓舞。”⁷⁾从这段话中,自能感受到蒙文《丹珠尔》的刊刻,在蒙古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体会出这些经典的刊刻,对巩固蒙藏统治的重要作用。

三、汉文《龙藏经》的刊刻

《龙藏经》是中国古代官刻的最后一部汉文大藏经,又称《清敕修大藏经》、《乾隆大藏经》。然而,这些名称似乎远不如《龙藏》影响更广泛,使用更频繁。何为《龙藏》?其说法有二:一曰因其每函首册刻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的御制蟠龙碑形牌记;二曰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是以名之。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称谓,古代皇帝称为“真龙天子”,清入关前旧京盛京称“龙兴之地”,穿的衣服是“龙袍”,坐的椅子是“龙椅”,睡的床铺是

7)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134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龙床”，看的佛经当然是“龙藏”，历朝历代皇帝敕修的大藏经，由此都可称为“龙藏”。《嘉兴藏目录》载〈恳免赎请经典说〉曰：“兹幸逢圣明，颁给龙藏”，指的就是明代敕修的《北藏》。诚然，将《乾隆大藏经》称为“龙藏”，在清代就有了，〈大清重刻龙藏汇记〉说：“龙藏全部统结用板七万九千另三十六块，计连十五万四千二百一十一连”，即直称“龙藏”，这是对皇帝敕修大藏的尊称，与“龙牌”、“龙纹”关系不大，且题名中的“大清”意义明确，不会引起误解。因此，“龙藏”之名，并不是一个专指性很强的名词，《乾隆大藏经》或《清敕修大藏经》为是(以下简称《龙藏》)。

雍正帝笃信佛教，他在〈御制重刊藏经序〉中，把编刻汉文《龙藏》的目的说得很清楚：“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于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已。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即欲通过《龙藏》的刊刻，校正前代大藏经的讹误，确立《龙藏》在的大藏经中的权威地位。此外，至雍正末年，藏文《甘珠尔》、《丹珠尔》，蒙文《甘珠尔》皆已敕修刻竣，唯汉文大藏经未刻。清王朝统治的毕竟是一个汉民族人口最多的国家，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一部敕修的汉文《大藏经》，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也不利于安抚汉民族中的佛教信众，这可能也是雍正帝编刻《龙藏》的初衷。

雍正十一年(1733)，敕命在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委派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综理馆务，分设校阅官三人，由工布查、原任江苏巡抚邵基、翰林院侍读学士梁诗正三人担任；监督赫德、留德等九人；监造九龄、老格等六十四人(以上或是朝廷官员，或是有名的文人)；总率四人，带领分析语录三人，带领校阅四人，分领校阅六人等共三十八人(以上皆为南北丛林学识渊深的大德高僧)，合共一百三十三人。从事刻字、刷印、折页、装订的各种匠役多达八百六十九人。其中刻字匠就多达六百九十一人。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庄亲王允禄等奏称：“京师刻字匠役不过四百馀名，除上

谕馆、武英殿等处雇用二百馀名外，所馀无几。……特请准交三处织造，照所定刻经版一块，工价银七钱二分之例，令其招募数百名来京刊刻。”⁸⁾即从江南招募的高手刻工，就近百名。可见，《龙藏》的编刻，是集全国精英才得以完成的。

《龙藏》以明永乐《北藏》为底本刊雕，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十五印竣。雍正帝虽然没有看到这部大藏经的最后刊成，但他做了大量的前期组织、筹备工作，对于这部大藏经的刊成，是有大贡献的。全藏共收经1669部，7168卷，分装724函，7240册，又目录5册，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有折装本、卷轴装本两种。每版25行，折为5个半叶，半叶5行，行17字。以雍正帝〈御制序〉始，以《御录经海一滴》止，文字校勘精准，极少讹误，数百人操劂，字体工整，如出一手，刀法谨严，书法刚健，装潢讲究，物料上乘，迄今历近三百年，依然纸质洁白，墨色黑亮，实为清内府刻书的上乘佳刊。

有专家说：“《龙藏》与历代官刻大藏一样，敕雕者都怀有政治企图”，“并不是施主要‘广种福田’，也不是僧众要祝皇上万寿，祈求国泰民安，而是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图”。“都怀有政治企图”是不错的，对帝王来说，祈佛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祚绵长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政治企图，但由此就否定了大藏经刊刻的殊胜，否定了帝王“广种福田”的宗教诉求，就很难让人同意了。这关系到对中国古代佛教大藏经评价的基本问题，不得不多说几句。如专家在谈到中国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时，说：“这完全不是赵匡胤的本意，而是为了拢络人心，巩固国基”。颇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但翻遍史籍，也找不出“不是赵匡胤的本意”的任何记载；谈到明成祖朱棣时又说：“永乐皇帝登极，是从侄子建文帝手里夺的皇位，不太正当，其侄失皇位后，有一种说法是落发为僧了。于是他也表示崇佛，亦雕

8) 杨玉良，〈清《龙藏经》的刊刷情况拾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 第12期 第72页。

印《南藏》与《北藏》. 还重用僧人.”众所周知,“靖难之役”前,永乐帝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并任用僧人姚广孝为谋主,怎么可以说因为建文帝信佛,永乐帝才“表示”信佛并刊刻大藏经呢?对雍正帝刊刻《清藏》的缘起,自表面上来分析,是因为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刻的《北藏》“尚未经精密之校订,不足为据”,故要重刻.这种理由不可信,因为永乐《北藏》传至雍正时已逾三百年,影响几无,还有什么校订精不精之说呢!《北藏》是入清之前刊刻的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入清之后,历经兵燹丧乱,宋、元官刻大藏典文残落,刻版凋零,寺庙禅院供奉诵读的主要就应该是《北藏》,并且把它视为佛教典籍的官刻定本,在没有新的官刻大藏取代之前,怎么会“影响几无”?而且“北藏”经版清初储存在紫禁城内,康熙时宫内用此经版刷印数部,故宫现存“北藏”为康熙时内府重印本.自宋至元,刊刻大藏经是王朝时代的一个传统,清代明之后,以《北藏》为底本,校勘讹误,正是对这个传统的继承.这个传统难道就只有政治意义,没有任何文化、宗教意义么?至于所说的,因明末清初私刻《嘉兴藏》中有些著作宣传怀念前明的思想,雍正帝“既不能下令禁毁佛藏,消弭反清宣传,又不能坐视不管,任其摇动大清根基,于是便想出了重刻大藏,剔除这些书的办法”,更让人莫名其妙.其实,皇帝无需禁毁整个大藏,只需一纸禁令,以“反清复明”为口实,把这些作品从《嘉兴藏》中撤出销毁就是,乾隆帝对先皇老子和自己“钦定”的《龙藏》删削增补都毫无顾忌,对一部私刻大藏,又有什么能与不能?《嘉兴藏》遂刻、遂印、遂发行流通,散藏民间寺院,年代又远、查禁销毁,确实不易.因此,笔者认为,历朝历代大藏经包括《龙藏》的刊刻,皇帝对佛教的崇信,广大佛教僧俗信众的支持,通过刻印大藏经广种福田、弘扬佛法,是一个重要目的,在刊刻中贯彻皇帝的意志,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也是必然的.就如赵朴初先生所言:“自宋初创刻大藏经,而后历朝无不以刊刻大藏经为胜国大事”,这才是历朝历代刊刻大藏经的真谛.

清朝廷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刻的这部大藏经,成书后印量并不大.乾隆四年(1739)首次印了一百零四部,是为初刻原刊本,二十七年又增补刷

印三部。由于乾隆三十年之后三次禁书毁版，只有这一百零七部才是乾隆三年编竣后印制的原始的完整本子。这批本子，除少量用于赏赐亲王、内府收藏外，绝大多数都发给直隶各省寺庙供奉，清宫陈设两部供奉万善殿。其后，嘉庆二十四年刷印三部，道光六年、十四年又以聚珍馆存银各刷印四部，寺庙禅院自备资金请印大致在二十部上下。入民国后，1933年林森等人发起在在南京中山陵建藏经楼，安奉历朝大藏经。当时佛教界著名人士及南北各大丛林群起响应，筹资附印达二十二部；1936年，宋哲元等八人组织筹资刷印八部，以上也许并不是一个完整数字，尚有零星刷印未统计在内，但合并计算，自乾隆四年至1949年二百馀年间，总数也就在一百五十至二百部之间。传至今日，仅沈阳慈恩寺、湖南省图书馆等有数的几个大型收藏单位尚存有初刻原刊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十八年重修北京妙应寺白塔，立〈御制重修白塔碑铭〉中载：“大清乾隆十有八年，岁次癸酉秋七月，重修妙应寺石塔，朕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胜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二十四函，用以为镇。”⁹⁾但塔中是否确实奉置了这些佛教物品，置于塔内何处，皆语焉不明，故人们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白塔严重受损，1978年对白塔进行修缮时，在塔上的铜质宝瓶内发现了〈碑铭〉所记的《大藏真经》(即《龙藏》)七百二十四函，从卷数和奉置时间看，正是初刻原刊而且未经抽毁的本子，十分珍贵，可惜的是宝瓶有部分焊接处有渗漏现象，使部分经卷浸湿霉烂，已难复旧观了。

《龙藏》经版刻竣，就存储在贤良寺藏经馆后移至紫禁城武英殿内，后为请印方便，谕旨移存北京柏林寺。清末社会纷乱，经版刷印高潮已过，管理渐疏。民国九年，叶恭绰等人以“度版房屋岁久失修，部款支绌，既属无可挹注，而常住清苦，又复难于张罗。若不及时修葺，妥为保护，实觉朽坏堪虞”为由，呈请北洋政府内政部，要求加强整理保护，仍归柏林寺负责。

9) 妙舟，〈北平妙应寺记〉，《微妙声》1937年 第四期。

1933年,内政部命令将《龙藏》经版拨交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1936年对之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清理,释范成写的《修整清藏经库版架记》对这次清理记之甚详.1951年,故宫博物院将经版移交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时尚存经版78289块.“文革”期间,经版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书库中搬出,搁置在院内简易房内,无人问津,致使部分版片潮湿发霉.十年内乱结束后,经版移交北京市文物局保护,存放于东城禄米仓智化寺内.1988年文物出版社重印这部大藏经时,存经版73024块.2012年,北京市文物局委托邦普公司补刻缺失版片,待补齐后刷印,经详细清点,则只余版片69410块了.也就是说,1949年后,版片又已佚失一万馀块,何时失去,已经难以考察了.此次补刻完成后,《龙藏》版片可复全璧,盛世修典,法宝重光,这部历经近三百年风风雨雨的大藏经,自此当可长存无虞.

近年笔者参与对故宫藏经版的整理及对清乾隆三年(1738)刊刻的《龙藏经》原刻经版进行重新整理研究、刷印,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其一,《龙藏经》历史上对它的研究学者众多,研究的深度广度及出版传播的数量可称极致,其他佛教大藏经中无可比拟者.在整理中发现千字文“方”字号经版《维摩诘所说经》经文前有“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初六日”款识,《龙藏经》为乾隆三年刊刻完成,经文中为何出现“三十九年”款识,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乾隆三年刊刻完成的《龙藏》雕版出现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的款题,经查有关清内府修造《龙藏经》及有关档案中无载,研究者也未曾提及,此经版千字文为“方”字号,“方一”为《御制重刻维摩诘所说大乘经序》,从序文中可知,乾隆帝认为《维摩诘经》乃姚秦鸠摩罗什所译,是经流传中华久历千余年,不无鱼鲁舛伪之失,命章嘉国师详加译定,音研句叶,务归精审,编辑成卷,更为难得的是此块御制序原刻经版存世,但存世印本的《龙藏经》中又无此序,经多方查找调查只湖北归元寺藏《龙藏经》中有此序,其他存世各部《龙藏经》中未见.据乾隆帝御制序看,《维摩诘所说经》已于乾隆三十九年

由章嘉国师重新删改厘定过，并命内府重新刻版补入，用北京白塔寺藏初印《龙藏经》本与现存其他处藏本相较，（白塔寺本为初印原本，未做删改，原因为此本乾隆八年(1743)装藏入此塔），全国其他多处藏本已删改过，但大多无此御制序，何因还待研究，经白塔寺本与现存经版新印本相较发现多处不同，如初印本名为《维摩诘所说经》，而后印本则名为《维摩诘所说大乘经》，后印本删去译者姓名，经文中也有多处增删，详见如图，对后人研究是经的内容校勘提供了新的数据。

其二，《龙藏经》的撤毁与删改问题，乾隆帝对《龙藏经》进行了三次撤毁、删改，档案中有载，《龙藏》编刻时就从明《北藏》本中删除了《出三藏记集》、《佛祖统记》、《禅门口诀》等40种有关宋、元、明禅学的重要作品，又根据帝王好恶增入一些明清僧人的语录和雍正帝御制的《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等书50种，亦即对入藏典籍已经做过一次筛选和审查，且又是敕修、钦定，本不该有什么敏感文字触及皇帝的神经，但至乾隆中叶，文字狱大炽，乾隆帝突然秋后算账，发起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焚书毁版事件。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谕：“昔我皇考曾命臣于刊刻《续藏》时，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覆，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和《辨伪录》、《永乐序赞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经钞》一种，亦据奏称撤毁。所有经版书籍，均经一体芟汰，期于澄阐宗门。”¹⁰⁾按照乾隆帝的说法，是雍正帝已经有对入藏典籍进行“量为删订”的考虑，不过尚未着手进行就“驾崩”了，而乾隆帝在上谕中提到的“一体芟汰”的典籍，指的是乾隆三十年、三十四年和四十一年三次抽毁事件。

乾隆三十年(1765)，“奉旨撤出钱谦益撰《大佛顶首楞严经蒙钞》一种。……计六十卷，板六百六十块。”¹¹⁾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常熟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藏书家。仕明官至礼部

10) [清]蒋良琪撰，《东华录》卷二十九，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11) [清]释范成，《修整清藏经板库架记》，《微妙声》1937年卷1第5期。

尚书，明亡降清，仍官礼部尚书。乾隆帝对降清的明朝臣子极为蔑视，他说：“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故谕令：“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¹²⁾ 在降清的明臣中，钱谦益是名声最著的贰臣，乾隆帝尤为厌恶，曰：“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臬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¹³⁾ 甚至作诗讥讽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其人既不足齿，其书复可留存，是乾隆帝的一贯作法，撤出钱谦益的著作，是顺理成章的事。

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奉旨撤出《永乐御制序赞文》、《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开元释教录略》和《辨伪录》四种十三卷，毁版一百二十八块。永乐帝发动“靖难之变”，逐走其侄子建文帝，得登大宝，《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说永乐帝是在佛的庇佑下的天下，无非想为自己正名。但在乾隆帝眼中就是“篡逆”，他说：“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¹⁴⁾ 《大功德经》为“以逆伐顺”的永乐帝张目，自然要裁撤。

乾隆三十八年上谕，是对这两次裁撤的一个回顾，也可以算做对《龙藏》清查的一个总结，但事情并没有完。四十一年，内务府查出《华严经》、《大乘显识经》、《入定不定经》、《方广大庄严经》、《佛说证契大乘经》、《大乘入楞伽经》等六种卷首有武则天《序》文。武则天授意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说她是弥勒佛化身下凡，应作天下共主，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 第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3)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

14)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中华书局，1986年。

声称她的龙兴，乃是佛的预言，废其子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改唐为周。武则天以一宫人之位投机钻营，藉助佛的语言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最终谋得大宝，对满脑子正统思想的乾隆帝来说，牝鸡司晨已属荒谬，所行猖狂悖逆更无可恕，岂能使其文字谬种流传，当然要删之以为后快。

在禁毁上述文字的同时，乾隆帝又把本朝编辑的一些佛教图籍增入大藏，计有：《御制翻译名义集》十卷、《御制大藏全咒》七十卷（即《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大藏全咒目录》十卷、《钦定同文韵统》五卷、《维摩诘所说大乘经》三卷及满、蒙古、西番文对照的《日食经》。乾隆三年刻成《龙藏》，雕版七万九千零五十六块，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则只有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块了。

在此次对《龙藏》的经版整理过程中，有同仁发现千字文“庶”字号经版，〈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末行“天童密云禅师年谱终”，此文后雕版有字体被铲的痕迹，被铲掉删掉的是什么内容，前人无人论及，从存世的或全或残的多部印本《龙藏经》中查阅终于发现，沈阳慈恩寺藏本与其他各处藏本不同，多出内容为“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天童密云禅师塔铭作者为“海印弟子虞山蒙叟钱谦益盘谭谨造”，为何此处“塔铭”的文字在经版中被铲去，刷印成册的经文也被撤毁，在档案中还没有找到相关记载，笔者认为这与乾隆三十年撤出钱谦益撰《大佛顶首楞严经蒙钞》的原因相同，这则内容在前人学者的研究中为何无人提及，笔者猜测或是被忽略或是因研究者只是对一部经的个案研究，没能多部经之间互相查阅校勘。因此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提到重视原刻书版经版的调查研究，对印刷史研究、版本著录、文献整理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和依据。这二则问题的发现对今后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四、满文《大藏经》的刊刻

就如称《乾隆大藏经》为“龙藏”一样，《满文大藏经》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满文在清称“清字”、“国语”，所谓满文是后人依据语言的民族属性的称谓，清代人不会把“国语”称为满文。乾隆帝为这部大藏经所撰的序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清人阿桂在《八旬万寿盛典》中则说：“乾隆五十五年，命以《清文翻译全藏经》成，皇上亲制序文申训。”¹⁵⁾故《清文翻译全藏经》才应该是它的正式书名。好在中国古代仅刻印过这一部满文大藏，称之为《满文大藏经》也不会引起任何误解。

是经刻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72~1794)，是以汉文《大藏经》为主，兼以蒙文、藏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清文翻译全藏经》。¹⁶⁾共一百零八函(夹)，收佛教经典六百九十九种(法鼓佛教学院据2002年出版是经增加三种为732部，目录与内容不符)，计二千四百六十六卷。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七十六函(夹)，六百零五种(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三十二函(夹)，八百余卷。较其目录、装帧形式及版框尺寸，均为清内府“清字经馆”原刻朱色初印本。每函皆由经叶、内层护经版、内经衣、外层护经版和外层经包袱组成。内护经板皆为木质，外包金黄色织锦面，内上层经板用五层织锦经帘覆盖。经帘多为缣丝制品，有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白色五色。五色分别代表五方佛，依次为：黄色——宝生佛，红色——无量光佛，绿色——不空成就佛，蓝色——不动佛，白色——卢遮那佛。中间凹进部分正中呈泥金满文书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卷数，两侧各彩绘佛菩萨像一尊，每尊佛像右下角书藏文、左下角书满文佛菩萨名号，又在两尊佛像的框边，由右至左以汉、蒙、藏、满四体

15) [清]阿桂，《八旬万寿盛典》卷十四，学苑出版社，2011年。

16) 章宏伟，《清文翻译全藏经书名、修书机构、翻译刊刻时间考》第16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文字用直书方式恭题该函(夹)第一部经名及经叶数(右框边书汉文经名卷数及页码。内下层经版的凹下板面绘四或五尊护法神图像,每尊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直书该佛名号,右框边以汉文、左框边以满文恭题该函(夹)的第一部经名、卷次及页码。经叶四周绘八吉祥图案,两端一侧彩绘喷焰摩尼图,一侧彩绘火焰图,火焰图中又题写该函第一部经名字样,不但整齐有序美观,而且利于经叶码放,不致错乱。外层上护经板为弧形,木质红漆描金,版面凸起,四框正中由左至右以泥金绘出胜利幢、金鱼、宝瓶、妙莲、右旋海螺、盘肠、宝伞、金轮八吉祥图案。为便于搬运及收藏保护,内层经叶、经版要用丝质黄色的经衣包裹起来,外夹板并用长约25米的五彩经缘把整部经函捆扎起来,外面再用1.5米见方的绸面黄色丝棉经袱包裹,用黄色笺条粘于包裹外,注明该函卷数,就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函(夹)。

1854年(咸丰四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首先言及此书,自此后穆璘德、劳费尔、伯希和、内腾虎次郎、福克思等东方学家对于《满文大藏经》的有无,及是否尚存于世等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嗣后,故宫博物院成立,《满文大藏经》复现于世。¹⁷⁾ 据载,1932年日本人多田等观(原日本东北大学讲师)在承德避暑山庄调查时又发现珠像寺珍藏一部,但今已不知去向。另有记载称,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一部,京都大谷大学存一部,但未见《世界满文文献目录》著录。笔者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看书,确认无是经,藏有一部康熙59年蒙文甘珠尔。现已知西藏布达拉宫收藏一部(缺一夹与故宫藏本同)。钱婉约著《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写到:日本近代中国学开创者内藤胡南(1866~1934)于1902年在奉天喇嘛教寺中发现“东洋学上非常重要的宝物”——《满文大藏经》,在日本军方出面强行压价买下了奉天城北郊法轮寺收藏的《满文大藏经》和黄寺收藏的明代泥金写本《蒙文大藏经》,一起带回日本,藏于东京大学,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除上述以

17) 韩儒林,《穹庐集》第4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外,《满文大藏经》再无存世的记载。¹⁸⁾ 据清嘉庆朝礼亲王昭槤《啸亭杂录续录》中所载,为刷印该书所雕刻的几万块梨木经版尚存:“初储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储焉。”¹⁹⁾ 外界鲜为人知。幸运的是,这批数以万计的经板,现今仍完整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满文《大藏经》的译刻是一项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如此大规模文化活动的出现,往往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清王朝进入乾隆时期,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曾在《世界文明史》中概括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十八世纪,中国不仅在疆域和人口方面冠于全球,同时也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纂修,《满文大藏经》是与《四库全书》几乎同步推出的又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乾隆帝视它与《四库全书》、“十全武功”之记述同等重要,它也是满族文化史乃至整个清代文化史中的大事。

三世章嘉国师为此经编译发凡起例,而满文大藏经以翻译佛的教义为主,其它后世的论述则不必翻译,并得到乾隆的首肯并实施,蒙古地区兴建的藏传佛教寺院更为盛行,除清廷敕令修建的寺院外,蒙古的王公贵族也竞相兴建,到清末漠南蒙古(今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达千所之多,每旗都有寺院。

顺治帝多次遣使延请五世达赖,1653年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颁发金册金印,对格鲁派又一大活佛系统的权力地位以正式明确。康熙五十二年(1713)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

藏传佛教寺院:西藏布达拉宫(三界殿)、扎什伦布寺(汉地殿),北京宗镜

18) 赵珍著,《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原藏有满文《大藏经》三部,藏法国巴黎图书馆一部,“殊像寺两侧山墙,经橱存放两部。日本盘踞承德时运至东京一部,现一部下落不明”,三秦出版社,2003年。

19) [清]昭槤撰,《啸亭杂录续录》卷一“清经字馆”第385页,中华书局,1980年。

大昭之庙(宗镜大昭之庙日台北楼、白台南楼)、香山宝谛寺,热河殊像寺、普陀宗乘寺(都是殿群楼西而下第三层七间内)、须弥福寿寺(北楼三层),盛京(沈阳)法轮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圣祖重刻《番藏经》序〉称:“祝颂两宫之景福,延万姓之鸿庥,番藏旧文,爰加镌刻。”经过十多年,藏文《甘珠尔》刊刻完成.康熙五十五年后又刊刻了蒙文《甘珠尔》,六十年又继刻藏文《丹珠尔》,乾隆十四年完成.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又下令以明代汉文《北藏》为底本刊刻汉文《大藏经》.乾隆三年(1739)完成,又称《龙藏》.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又将藏文《丹珠尔》译成蒙文,与康熙五十九年译刻的蒙文《甘珠尔经》合成为一部完整的蒙文《大藏经》.至此,清宫中刊刻的《大藏经》已有藏文、蒙文和汉文三种.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文殊大皇帝(乾隆帝)认为,自己出身的满族人口众多,信仰佛教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为满文之佛教经典,若将佛说《甘珠尔》译成满文实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从学府中成绩优异人员和在京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乾隆帝于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降旨:“《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现时蒙古字经亦具翻译付镌,惟清字经尚未办及……”又下旨:以汉文“《大藏经》中咒语乃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翻译,惟是咒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乾梵韵不啻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针对“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乾隆帝认为开国至今未能刊刻国语《大藏经》,“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寔为阙略,因特开清字经馆”,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关于清字经馆的设置开馆时间有很多不同观点,据章宏伟先生《清文全藏经翻译刻印起止时间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2),此推论乃以内府档案为据.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满文档案中有一则从“内务府军机处抄出”的永瑑、永璇、和珅、福隆安四人的奏折.从奏折可知,乾隆三十六年(1772),章嘉呼图克图

已就翻译满文《甘珠尔》经上奏乾隆帝，并同时提出了翻译满文《甘珠尔》经的原则：内容只选择让众生皈依佛教的经文，译经先从般若经开始，从汉文译满，再用藏、汉文经文来仔细校勘。章嘉国师的奏折呈交后，乾隆帝立即做了批示，马上照办，并钦点永瑑、永璇、和珅、福隆安四人与章嘉共同办理此事。乾隆三十六年(1772)十二月十五日永瑑、永璇、和珅、福隆安四人奏：“这次办《甘珠尔》时，理应找一个近处，双城(紫禁城)找一个地方。内翻书房太小，翻译馆员也比较少。如果紫禁城外面还要找别的房子，比内翻书房还远了，干活不方便。臣等看得经咒馆内闲置房比较多，又在紫禁城内，很近很方便。如可以，尽可能地多占几间他们的房子，在那里办理经。”这份奏折除明确了清字经馆成立的约略时间、选址方案，还就人员选配、费用安排、译校程序、归属用印诸问题作了通盘安排，并付诸实施。从中还可知，此“译经处”(即清字经馆的前身)是专为修《清文翻译全藏经》而设，辖属内务府。

清字经馆位于紫禁城中西华门内。设置之始，乾隆帝谕旨：“简派皇子、大臣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候朕裁定。今据章嘉国师奏称：唐古忒《甘珠尔》经一百八部，俱系佛经。其《丹珠尔》经内额讷特珂克得道大喇嘛等所传经二百二十五部。至汉字《甘珠尔》经，则西方喇嘛及中国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拟将大般若、大宝积、大集华严、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经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并小乘律，皆西土圣贤撰集，但内多重复，似应删繁就简。若大乘论、小乘论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后代祖师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无庸翻译等语。所奏甚合体要，自应照拟办理……”并选派人员包括总裁四人，副总裁三人，提调官五人，纂修官九人，收掌官十八人，阅经总裁一人，阅经副总裁四人，办理经咒喇嘛四人，校对喇嘛四人，总校僧人二人，诸经僧四人，共九十六人。其中总裁有和硕质亲王永瑑、多罗义郡王永璇、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副总裁为吏部尚书金简及西藏著名高

僧章嘉呼图克图国师等，他们皆精通经史，博学多闻，这使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在人力上有了可靠的保障。为使译经顺利进行，乾隆帝又下旨：“兹清字经馆正当发凡起例之始，如不立定规条，致禅和唾馀剽窃，亦得因缘贝夹，淆乱经函，转乖敷扬内典之指，可将章嘉国师奏定条例清单，交馆详晰办理……”并降旨规定：“除现在刊定藏经毋庸再为删削外，嗣后凡别种语录著述，只许自行存留，倘有无识僧徒妄思衰辑汇录，诡称续藏名目，覬欲窜淆正典者，俱一概永行禁止”。²⁰⁾ 在乾隆帝的严格要求下，译经工作顺利展开，“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皇上审阅。皇上在审阅中又更正其中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皇上悉心审阅后，还要作译记。因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

经过十八年的努力，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满文大藏经》翻译工作全部完成，部分经卷印刷成帙。同年二月乾隆帝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云：“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为，天何从佑？然而为事又在循理，为不循理之事，天不佑也！予所举之大事多矣，皆赖昊乾默佑，以底有成。则予之所感颺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语形容。而方寸自审，实不知其当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屡言之，若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馀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夫耳顺古希，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蒞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至于以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祝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馀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缺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

20)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甲戌”，中华书局，1985年。

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再彼也。兹以耄耋观藏事,实为大幸,非溺于求福之说,然亦即蒙天福佑,如愿臻成所为,益深畏满怵惕儆戒而已耳。是为序。”²¹⁾此外,出于统治需要,乾隆帝必须致力于保存弘扬满族的文化习俗,他在位期间曾编辑翻译了大量的满文书籍,如《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新旧清语汇书》、《御制五体清文鉴》、《五体字书》、《满蒙文鉴》、《满蒙汉三和切音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等。这些书籍的编辑出版,为当时满族文化的发展,也为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和使用奠定了基础。鉴于佛教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对清帝国的影响,为争取控制西藏并收服蒙古各部,乾隆朝还修建了众多的寺庙,在部分寺庙中由满族人出家做喇嘛、任主持,诵满文佛经,从而加大了满文佛经的需要,促进了《满文大藏经》的译刻。

在《满文大藏经》翻译告竣且部分经卷刷印完成的同年十二月,译经处清语经馆遭遇大火,损失严重。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西华门内之清茶房外果房失火,延烧房屋及乐器,经奏间被焚烧……至此项经卷虽未全行焚毁,但一经搬损,必致残缺失次。其版片俱系梨木,不但已经刊刻者徒费工料,即奉经刻字者亦觉可惜,所有被烧刻字版是否存有刷印底稿,若竟连底稿被毁不全,岂不更为费事!此项经卷内如《大般若》、《二般若》等经,曾经各刷十分,颁发盛京前、后藏等处供奉,如现在经馆内所存版片、卷页多有不全,尚可从容缓办。其未经颁发各经最关紧要,其中每部经文,有已经刊刻完竣刷印成部,版片、卷页多被烧毁者;有版片虽经烧毁,而刷印卷页尚存者;有刷印卷页烧毁,而版片尚存者;有版片未经刊刻完竣即被烧毁者,均不可不详细检查,将所存版片、卷页逐一核对,以便互相补辑,俾臻完善。”²²⁾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五年《满文大藏经》只是完成了

21) 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九。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五册 六六九页;“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档案出版社,1991年。

翻译, 尚未能全部付梓, 刊刻完成者也有部分被焚. 现存的《满文大藏经》中, 部分经叶经版为五十五年后重新雕版印刷的. 另据乾隆五十九年清内府《活计档》记载:“所有本馆办理颁发《大般若》、《阿含》等经统计一百零八套, 每套十二分, 陆续实收过此处装函, 共壹千贰佰玖拾陆套, 相应付覆查明, 可也. 等同回明.”²³⁾ 另据档案记载, 《满文大藏经》刊刻中的工价、经费、使用情况:查清字经馆应行翻办刊刻刷裱装潢全藏大般若等经至师律戒行经共二千五百九十六套, 计一百八套, 每套十二分, 统计一千二百九十六套. 自三十七年开馆起至五十八年正月, 共颁发过大般若等经一千一百四套, 共用过刻字工价银三万二千一百二十两, 写版工价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七钱, 漆边工价银五千四百四两六钱, 刷裱工价银一千六百三十四两三钱, 绘画佛像工价银三千一百五十五两九钱, 办买棉连四纸价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七两六钱, 办买太史连纸毛头纸黄笺纸黄布袍木盘等项物料工价银四千三百八十一两五钱, 办买红花水价银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三两三钱. 纂修翻译收掌誉录校对和尚喇嘛供事苏拉人等饭事计二十一年用银一千六百十五两五钱. 恩赏闲散人钱粮计二十一年共用银十一万九千二百十六两. 每月需用纸张笔墨计二十一年通计共用过银一万八百十五两八钱. 以上共用过银五十一万四千八百三十两八钱. 现在刊刻师律戒行经十六套, 计应刷裱一百九十二套, 所有刊刻、写版、漆边、刷裱工价, 采买纸张、红花水、笔墨以及公费饭食等项经贸部尚需银四五千两, 行取梨版价值每块四钱, 共约需银二万五千六百馀两, 运版脚价约需银二千五百馀两, 棉连四纸约需银九千一百馀两, 白本纸、榜纸共约需银一千三十馀两, 装潢每套二十五两四钱, 统计装潢一千二百九十六套, 共约需银三万三千四十三两. 据统计, 纂修、翻译、刊刻、刷裱、装潢全藏经完竣, 约需物料工价银五十九万一千馀两.

据上所述, 清字经馆陆续收过装函佛经1296函, 每部《满文大藏经》108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五十九年二月《活计档》.

函. 全部《满文大藏经》刷印装潢的完成应为乾隆五十九年, 共刷印12部, 五十九年后未见重新刷印的记载. 原刻经版现存故宫博物院.

结语

综上所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 经过历代的传布、翻译、汇集、编次, 久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 经过历代的传布、翻译、汇集, 编次, 久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宝藏. 其中, 大藏经的撰集、刊刻是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的事业. 经过调变印刷术的发明, 宋太祖开宝四年首开雕印大藏经的先河之后, 各朝都进行大藏经的刊刻, 如辽有契丹藏、元有元官藏、明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和藏文《甘珠尔》等, 其后递代不绝. 入清之后, 内府进行藏、蒙、汉、满文大藏经的刊刻, 成为刻印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 相比于汉传佛教, 清代诸帝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 其中既有个人宗教信仰的倾向性, 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 对于朝廷而言, 这些藏、蒙、汉、满多种语言的大藏经刊刻, 远远超过宗教本身, 是强化对藏蒙的统治, 笼络、怀柔蒙藏上层的工具. 总之, 入清之后, 藏、蒙、汉、满文大藏经皆有刻, 是历代中央政府刻印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

参考文献

-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
-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
- [清] 昭梈撰，《啸亭杂录续录》，中华书局，1980年。
- 清高宗，《御制文三集》。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档案出版社，1991年。
- [清] 蒋良琪撰，《东华录》，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法)海瑟·噶尔美着；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月。
-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蒙古佛教史》，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
-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民族出版社，1988年。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清] 阿桂，《八旬万寿盛典》，学苑出版社，2011年。
- 章宏伟，《清文翻译全藏经书名、修书机构、翻译刊刻时间考》，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 赵珍着：《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三秦出版社，2003年。
- 李国强，〈康熙朱印藏文《甘珠尔》谈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
- 安双成，〈蒙文《甘珠尔经》与藏文《丹珠尔经》制版概述〉，《历史档案》1989年 第2期。
- (印度)罗克什·钱德拉，〈蒙古文《丹珠尔目录》前言〉，《蒙古学资料与

情报》 1991年 第3期.

杨玉良, <清《龙藏经》的刊刷情况拾遗>.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9年
第12期.

妙舟, <北平妙应寺记>, 《微妙声》1937年 第四期.

[清] 释范成, <修整清藏经板库架记>, 《微妙声》 1937年 卷1 第5期.

국문개요

청대 내부의 대장경 간행

翁連溪 · 이경민

한 대부터 불교가 중국에 전해진 이후 대대로 불경에 대한 번역과 수집은 이미 중국 문화와는 떼려야 뗄 수 없는 구성 요소가 되었으며, 중국 민족 공통의 정신적 유산이 되었다. 대장경은 “일체경(一切經)”으로도 불리기도 하고 약칭으로 “장경(藏經)”, “결경(契經)” 또는 “삼장(三藏)”이라고도 한다. 즉 인도와 서역에서부터 전해져 번역된 대·소승의 경(經), 율(律), 논(論)과 성현들이 집대성해 놓은 대형 총서들로 불교 경전의 총집으로, 권질이 매우 방대하고 복잡하다. 송대 이전에 대장경은 모두 손으로 베껴 쓰는 형식으로 편찬되었다가, 5대 10국 시대의 민국(閩國)의 임금 왕심지(王審知)는 “금니 은니 일만 여 냥”으로 4부의 《금은자대장(金銀字大藏)》을 베껴 쓰기도 했는데, 많은 재화와 오랜 시간을 들였음에도 대량 생산을 하지 못했다. 목판인쇄술이 발명된 후 대장경의 인간이 가능하게 되었다. 《불조통기(佛祖統紀)》 권43의 기록에 따르면 송나라 태조 개보 4년(971)에 “고품과 장종신에게 칙서를 내려 익주로 가 대장경판을 조각하게 하였다.”(勅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版)라고 기록하고 있는데, 이것이 처음으로 대장경을 간각한 기록이다. 그 이후에 여러 조대에 대장경이 간행되었는데, 예를 들면 요대에는 거란장이, 원대에는 원관장이, 명대에는 홍무남장, 영락남장, 영락북장과 티벳어 《감주이》가 간행되었다.

청대로 접어든 후 청 왕조의 내부(內府)에서도 이전 왕조의 전통을 이어 받아 강희 8년의 티벳어 금니 필사본 《감주이》를 시작으로, 강

희 39년의 티벳어 《감주이》, 옹정 2년의 티벳어 《단주이》, 강희 59년의 몽고어 《감주이》, 건륭 14년의 몽고어 《단주이》, 건륭 3년의 한문 대장경 《용장》, 건륭 59년의 만주어 《대장경》을 티벳어 대장경인 《감주이》와 《단주이》를 시작하여 몽고어 대장경, 한문 대장경과 만주어 대장경 등 서로 다른 언어로 된 대장경을 인간하였다. 이로써 청대는 역대 왕조 중 가장 많은 언어로 대장경을 인간한 시대로 기록되고 있다.

특히 청은 역대 황제들이 티벳 불교를 숭상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이민족들을 통합해야 하는 정치적 필요가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러한 티벳어, 몽고어, 만주어 대장경의 간행은 그 본연의 종교적 의미도 매우 중요하지만, 이와 함께 이민족의 지배층을 통치하고 융합하고 회유하는 하나의 도구로서의 역할도 매우 중요했기 때문에 청의 역대 제왕들은 다민족 언어 대장경의 간행을 매우 중요시 하였다.

주제어 : 대장경, 티벳어 대장경, 몽고어 대장경, 만주어 대장경

